

# 升起夺取全国决定性胜利的曙光

——探寻辽沈战役里的红色记忆

在辽宁锦州市区西北,有一座公铁立交桥——士英桥,桥边的路基上就是著名的梁士英炸地堡遗址。

“辽沈战役时,部队打到锦州城西北角,一座地堡始终没有拿下。爷爷主动冲到地堡下,把爆破筒塞进了敌人的地堡里。他刚要转身,敌人就把这个爆破筒从地堡里给推了出来,这个时候爷爷就用自己的身体把地堡枪眼给堵住,与敌人同归于尽了。”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讲解员梁丹丹每次讲起这段往事都难过得不已。

梁丹丹是梁士英烈士的孙女,23岁来到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工作,因为她从小就一直有一个想法:要在这儿,陪着爷爷。

锦州地处辽宁省西南部,历来是军事重镇,被称为东北的“咽喉”。73年前,辽沈战役在锦州打响,103万东北人民解放军浴血奋战。

东北有多重要?1945年6月,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指出:“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1948年,东北境内国民党军队被人民解放军分割包围在长春、沈阳、锦州三块孤立的地区内,只有北宁线作为同关内联系的通道。歼灭在东北的敌军,就能获得解放战争的战略总后方。

1948年9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及毛泽东同志电令东北人民解放军首先发起辽沈战役。

一场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战略大决战在辽沈大地打响。

1948年10月14日11时,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在城西北的牯牛屯村发出了总攻命令。经过一番激战,除锦州城东第八纵队外,各主攻部队全线突破。

九位冲锋战士冒着炮火奋勇向前——在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内,一幅主题为“决战决胜”的大型浮雕,让人深刻感受到这场战役的胜利来之不易。

在锦州城外作战中,配水池战斗最为惨烈。战斗遗址上密密麻麻的弹孔诉说着当年激烈的战斗场面。

这里原是日伪时期建设的一个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供水站,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与附近的据点形成了城北外围的防御体系。

“担任攻打配水池任务是第3纵队7师20团1营,他们提出‘攻配水池的都是打铁的汉’的响亮口号。1948年10月12日8时,1营发起冲击,激战到傍晚5时,一个营最后能战斗的只剩下6个人。”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主任刘军讲述。

得人心者得天下。在众多学者看来,包括辽沈战役在内的解放战争的最终结局,其实早已注定。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最终获胜的根本原因。”辽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副所长孟月明说。

“战场上,人民军队指挥员‘跟我上’与国民党军督战队‘给我上’形成鲜明的对比。”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曙光说,在战场之外,父子、妻送郎,兄弟争上前线,人民群众踊跃支前。

东北民主联军(1947年更名为东北人民解放军)自1945年在东北组建,屡屡以弱胜强不断壮大,从最初的13万人,到辽沈战役开始前,拥有野战部队70万人,地方部队30万人。这与广大群众的支持分不开。

辽沈战役胜利后,国民党总兵力下降到290万人,解放军总兵力上升至300万人。“中国的军事形势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辽沈战役结束后的第5天,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说,“这是中国革命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

“辽沈战役特别是锦州之战的胜利,为新中国成立迎来曙光。”刘曙光说。

如今,中国已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百姓的生活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辽沈战役烈士纪念碑上的英烈铜像 (新华社发)

“在辽沈战役期间,西柏坡和牯牛屯两个小村庄间往来电报近百封,牯牛屯这个小村庄见证了辽沈战役胜利的全过程。”刘曙光说。

硝烟散去,如今的牯牛屯村已经成为锦州有名的红色精神教育基地和红色旅游景点。随着红色旅游的不断升温,牯牛屯村的面貌日新月异。村里的道路全部建成了柏油路,路边的数百盏路灯照亮了家家户户,自来水入户100%,每家都建成了抽水厕所。

战争期间,人民群众推着小车支援前线;和平年代,军民鱼水情更深。

锦州市地藏寺满族乡十年九旱,土壤贫瘠,是辽宁省脱贫攻坚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2018年以来,锦州军分区协调24个团级以上驻军单位与当地政府协同攻坚,实现了整乡脱贫。

地藏寺满族乡杨树沟村村民高柱民双目失明多年,老伴患有帕金森综合征,老两口仅靠低保维持生活。

锦州军分区得知情况后,马上协调当地驻军和政府,通过低保、残疾补助、建档立卡贫困户等多种方式帮助他们,如今高柱民老两口每年能有1万多元的收入。

“像我们这样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每月不仅有分红拿,生大病了村里的集体经济还能给些补助,真是做梦也不敢想的呀!”高柱民说。

“锦州是一座英雄城市,军队跟老百姓之间鱼水情是天然的。我们要把这种好的传统传承下去,共同创造锦州美好的未来。”锦州市委书记王德佳说。(新华社沈阳2月23日电)

## 隐秘而光荣

探寻西南联大地下党往事

说起西南联合大学,许多人也许并不知道,这所诞生于抗日烽火之中的高等学府,同样为中国革命孕育了珍贵“火种”。西南联大的地下党员,既要刻苦学习文化知识,又要隐秘开展革命活动,在中国革命史和青年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

### 一所学校党员曾占云南三分之一

走进位于昆明市中心一二一大街的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旧址及博物馆坐落在校园深处。留存于旧址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西南联大原教室、“一二·一”运动四烈士墓等遗迹,无不在诉说那段艰苦而辉煌的办学历史。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与文化命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被迫南迁湖南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不久,南京陷落,日军溯江而上,危及长沙。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西迁入滇,4月抵达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不仅有优良的学术传统,更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比如,北大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方最早建立支部的单位。”长期研究西南联大历史的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吴宝璋说。

西迁昆明后,西南联大的地下党员一度与组织失去联系。

“到1938年秋,西南联大才重新开始建立党组织。”吴宝璋说,1938年10月,被党组织派到大后方开展工作的原北平崇德中学地下党支部书记易周在考入西南联大后,与其他3位党员共同成立联大临时党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

自此之后,西南联大党组织逐渐发展壮大。在西南联大党员人数最多的1940年,全校共有党员83人。

“当时云南全省仅有247名党员,西南联大就占了三分之一。”吴宝璋说。

据《北京大学校史》记载,当时,西南联大党组织是云南党员人数最多、最集中、力量最强的地下党组织。联大地下党组织团结广大师生,在开展抗日爱国民主运动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 牺牲36年后,世人才发现她是党员

据统计,在西南联大学习过的地下党员共有206人。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甚至献出宝贵生命。

被称为中共“超级特工”的西南联大学生熊向晖,1937年在长沙便受党派遣从事地下工作,以超人的机智、果敢、坚韧,赢得胡宗南赏识,巧妙送出国民党“闪击延安”“西安军事会议”等重要情报,毛主席称赞他“一个人可顶几个师”。

毕业于西南联大英语专业的地下党员傅冬菊,是抗日名将傅作义的长女。1948年,平津战役即将打响,党组织派在天津《大公报》工作的傅冬菊回到父亲身边,最终促成北平和平解放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一二·一”惨案中壮烈牺牲的四烈士之一,西南联大学生潘琰,直到她牺牲36年后,世人才发现,原来她也是一名共产党员。

1944年,29岁的地下党员潘琰考入西南联大师范学院。1945年12月1日,昆明爆发“一二·一”惨案,国民党特务闯入西南联大等学校,殴打、追杀学生。潘琰被手榴弹炸伤后,仍奋力抢救其他同学。暴徒用石块猛击她的头部,还用铁条猛刺她的腹部,待同学赶来救她时,她已奄奄一息。

潘琰牺牲时年仅30岁,临终前她还用微弱的声音叮嘱同学:“同学们,团结呀!战斗!战斗!”

“当时组织要求地下党员严格保密,潘琰的组织关系还没转来联大,所以学校不知道她是党员。因为在学校表现突出,西南联大地下党支部还曾准备发展她加入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馆长龙美光说。

直到1981年2月,经中组部确认“潘琰同志是中共党员”,她的党员身份才被后人所知。

吴宝璋说,西南联大办学8年多,有15位师生为了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献出了宝贵生命,其中有10名是地下党员。

“西南联大地下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基层党组织,但它又不是一般的基层党组织。”吴宝璋说,掀起了国内反内战、争民主高潮的“一二·一”运动就是在西南联大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这也是中国青年运动史上继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之后的第三个里程碑。”

### 联大红色记忆激励后人

抗战胜利后,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回到北方,而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则留了下来,成为如今的云南师范大学。

2011年9月,云南师范大学在原“一二·一”运动纪念馆基础上,成立西南联大博物馆。西南联大旧址及博物馆先后被列为全国首批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

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馆长李红英介绍,西南联大旧址及博物馆年均接待海内外参观者90余万人次,其中每年开展青少年教育不低于10万人次。博物馆还组建了学生义务讲解队,每年提供义务讲解5000多场。

西南师范大学2019届毕业生钱光美,曾是西南联大博物馆学生义务讲解队队长。她说:“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次为来自四川的中学生参观团讲解,听完故事后,很多学生已是泪流满面。”26岁的党员杨永琴也曾是西南联大博物馆的义务讲解员。如今在云南省楚雄市十分偏远的三街镇普鸣民族小学任教。“等孩子们再长大些,我也会给他们讲西南联大、联大地下党的故事。”杨永琴说。(据新华社昆明2月24日电)

## 穿过硝烟 看见你的底色

——寻找八路军总部抗战轨迹里的红色密码

火车缓缓停稳,太行山深处的武乡县迎来一拨远方的客人。

“过去不通,高铁,干啥都比别人‘慢一拍’。有了高铁,人能进来,产品能出去,太行老区的好日子在后头呢!”武乡县砖壁村支书李文军说。

这里,曾是八路军第一个敌后根据地诞生地,八路军总部等重要机构长期驻扎在此。

这里,群峰峥嵘,壁立千仞,曾是中国最贫瘠的土地之一。

斗转星移,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孕育的太行精神,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浩气长存。

### 在砖壁村缅怀英烈

山西武乡县砖壁村,峭壁如林,易守难攻。抗战年代,八路军总部曾3次进驻这里,1940年在此部署指挥了名震中外的“百团大战”。

“1940年10月30日凌晨,我军向关家垴发起总攻,敌人的飞机盘旋在上空,狂轰滥炸无数次。经过两天18次冲锋,还是没有拿下,我军伤亡惨重。”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第一代讲解员崔韶光介绍,关家垴战斗是百团大战进入反扫荡阶段最为惨烈的一场战斗。

1996年,崔韶光见到了百团大战亲历者李德生。

“您最难忘的战斗是哪一场?”

“你去过关家垴吗?”我们团增援上去后,只见满坡满沟,已经全部铺满了八路军的遗体。”

“那我们牺牲了多少人?”

老人面色凝重,默不作声,只伸出手掌来回翻动着,忽然泪流满面。

那一场战斗,成为八路军将士心中永远的高地。

百团大战打破了日军“囚笼政策”,牵制了敌人大量兵力,拖住了日军进攻我大后方的后腿,极大地振奋和坚定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决心。

### 在左权县找寻红色记忆

“此间一切正常,惟生活较前艰难多了,部队如不生产简直不能维持……想来太北长得更高了,懂得事情更多了……”1942年5月25日,写下这封家书3天后,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掩护总部机关突围中壮烈殉国,年仅37岁。

为纪念左权将军,辽县易名左权县。在左权县麻田八路军总部旧址,一张左权和妻子的照片引人注目,那是他们一家三口唯一的一张合影。

左权县党史研究室主任张俊平说,噩耗传来,妻子刘志兰悲痛欲绝,笔蘸血泪,写下了《为了永恒的记忆——写给权》。7年之后,左权母亲才得知,自己日思夜念的小儿子已为国捐躯。老人强忍悲痛,请人代笔撰文:“吾儿抗日成仁,死得其所。”

左权县文物局副局长姜彬说,包括党直接领导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内,八路军大小机关在左权县有160多个。“这些遗址遗迹中,60%都还保持着原貌。”

### 在高公村思军民血肉情

山西洪洞县高公村,朱德当年用过的一张炕桌,被群众保存了下来。76岁的村民李俊全指着炕桌上一处3厘米见方的浅坑告诉记者,当年朱老总寄宿李家祖宅,为处理抗战事务经常熬夜,有一次油灯不慎点燃了炕桌,留下这处“抗战印记”。

“1937年,八路军总部驻扎高公村期间,朱德曾给同窗老友戴与龄写

信求助,借款二百元以救济老母。”洪洞县党史办主任张春悦向记者展示了这封信件复印件,“革命数十年,没有分毫私人积蓄,党领导的八路军就是如此忘我无私。”

在太行山区,至今流传着许多“娘亲”养育八路军后代的感人故事。

山西红色文化研究学者戴玉刚向记者讲述:太行二分区政治部主任穆明德的孩子出生不久就被送到当地一位奶娘家。得知消息的日军穷凶极恶地找到奶娘家中,要她交出孩子。奶娘别心绞肉般交出自己的孩子,眼睁睁地看着孩子被日本鬼子的刺刀挑死……

这个获救的孩子名叫穆晋魁。在一份《太行奶娘》的口述回忆中,他这样说:“我出生在山西和顺,两岁多才回到母亲身边。母亲告诉我,没有奶娘就没有我,我就是太行山的儿子。”

### 在山西追寻红色足迹

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侵华战争全面爆发。

“1937年9月,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率部队东渡黄河,出师华北,创建了晋察冀、晋冀鲁豫三大抗日根据地,抗战烽火燃遍山西。”山西省档案馆副馆长、研究员巨文辉说。

整个山西沸腾起来。不到一年的时间,八路军主力部队由入晋时的3万人发展到10万人。

“8年抗战,左权县男女老少几乎全民参战支前。”张俊平说,山西这样的县还有许多,是名副其实的“八路军的故乡,子弟兵的摇篮”。

曾任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研究部主任的郝雪廷说,抗日游击战由山西推向广阔的平原,推向整个华北。抗战军民齐心协力,创造出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窑洞战等多种游击战形式,使日寇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山西战场反扫荡作战的频率和规模,在敌后战场首屈一指。”巨文辉说,山西是八路军敌后抗日的重要战场,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

### 太行精神浩气长存

沿着八路军总部在山西的迁移路线一路走来,记者欣喜地看到,一度“山穷水尽路绝”的老区已焕发新颜。

革命老区兴县是抗战年代晋绥边区政府所在地。2018年6月,往返于山西太原和这里的“察家崖号”列车正式通车,结束了这个晋西北老区不通客运列车的历史。

砖壁村,这个只有270多口常住人口的村子如今成了知名的红色旅游地。李文军说,旅游产业,加上土地流转、日光大棚等多渠道收入,让村民与贫困彻底告别。

在八路军根据地创建最早、规模最大的兵工基地黄崖洞,吊桥天险、保卫战烈士墓地、兵工厂车间等大批抗战遗迹被保存下来,默默诉说着当年抗战的艰苦卓绝。黄崖洞被列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4A级景区,游人逐年增长。

站在左权县龙泉乡连壁村的山头放眼望去,对面山岭上的光伏板漫山遍野,熠熠生辉。65岁的村支书郭亚林说,光伏发电让村里2000多亩荒坡荒地变废为宝,连壁村借此一年增收一百万元。

洪洞县万安镇高公村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支书李鹏鹏说,高公村通过发展物流等产业成为全县脱贫攻坚“排头兵”,“以前一年人均支配收入不过千元,现在翻了十倍。”(据新华社太原2月20日电)